

洛阳东汉有翼神兽“厌胜钱”考辨

霍宏伟

1974年，在河南洛阳东汉光和二年（179）王当墓中发掘出大批随葬品，其中有3件圆形铜牌^①，曾被认为是厌胜钱。后在整理该墓随葬品的过程中，又发现一件马纹铜牌。经过笔者考证，认为不是厌胜钱，铜牌上的有翼神兽形象分别为麒麟与天马。

一 兽纹“厌胜钱”考辨

1. 洛阳东汉王当墓概述

1974年7月，在洛阳市涧西区东方红拖拉机厂40分厂工地，考古发掘出东汉王当墓（编号为M1）^②。该墓为土圹前堂横列墓，方向为0度。由墓道（未发掘）、甬道、前室、后室、耳室等部分组成。墓曾被盗，器物出

于扰土中。随葬品有陶器、金属器等两大类。由墓中所出王当买地铅券可知，该墓纪年为东汉光和二年（179）。墓中还随葬铜钱295枚，出土时似有绳索穿在一起。其中有半两153枚，五铢133枚，大泉五十6枚，货泉3枚（图1）。另有3件“币形器”，简报中附有2件币形器的正面拓本。考古发掘及简报整理者朱亮、余扶危先生认为，“王当墓中的三件‘币形器’，图案别致，似与古代‘羊’和‘柿蒂花’纹饰相近，却又与汉代风格有所不同，可能是当时从外国传入的一种饰物，也可能是融合了中外艺术的装饰品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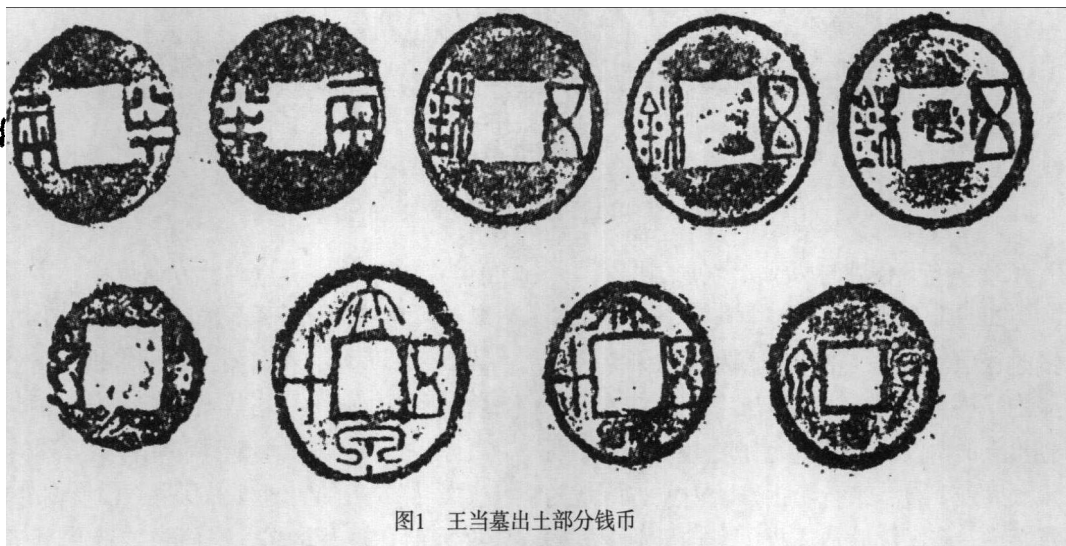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王当墓出土部分钱币

在后来对该墓资料的整理过程中，又清理出1枚马纹铜牌，形制、大小与已报道的3枚铜牌基本相同。圆形，宽郭无穿，面饰马纹。昂首，鬃发竖起，躯体肥壮，长尾上翘外卷，呈S形，三足挺立，一足抬起，其

上较近处有4个并列的梭形小饰物，背平素。直径28mm（图2）^③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马的身体前后，各以剪地形式剔出空白处，表示翼翅。



图2 王当墓新发现的马纹铜牌

2. “兽纹花钱”问题的提出

1997年，在洛阳市钱币学会组织编写《洛阳钱币发现与研究》过程中，我们将上述东汉王当墓出土的3件“币形器”收入该书第七章花钱部分。将其列为吉祥图案类花

钱，称为“兽纹花钱”与“柿蒂纹花钱”，并对其做了详细描述：“兽纹花钱2枚，图案相同。圆形，重郭无穿，内饰一兽，短颈顾首，短吻大眼，独角尖长略弯，兽身左右附弧形翼翅，长尖尾，瘦蹄足。平背无纹。一枚钱径27.5、厚2.5mm，重14.6g；另一枚正面图案稍模糊，钱径28、厚2.5mm，重14.3g。”“柿蒂纹花钱1枚。圆形，重郭，外宽内窄，无穿。面中心柿蒂纹由四个菱形纹围一圆点组成。其外围一周尖长锯齿纹。平背。径27、厚2.2mm，重13.4g。”文后附有3枚花钱的正、背两面拓本（图3）^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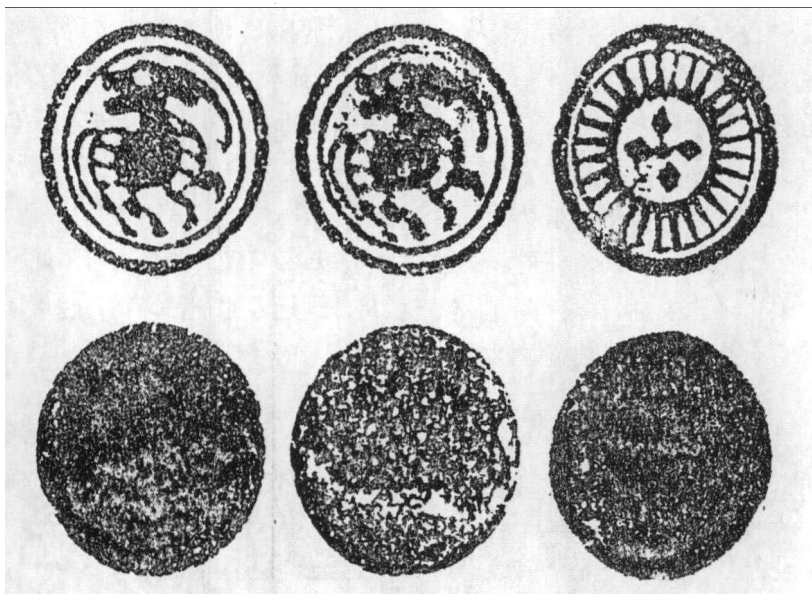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《洛阳钱币发现与研究》收录的3枚铜牌

3. 王当墓铜牌与两汉厌胜钱的比较

2009年夏季，笔者在收集有翼神兽资料的过程中，找出《洛阳钱币发现与研究》收录的“兽纹花钱”，将其与建国以来各地发掘出土的两汉厌胜钱进行了比较。其中，西汉厌胜钱2枚，来自于山东、内蒙古等地的汉墓中；东汉厌胜钱2枚，来自于河南宜阳北朝钱币窖藏与香港晋墓之中。

1971-1977年，在山东省巨野县红土山发掘一座西汉大型崖墓，有可能是武帝时期诸侯王昌邑哀王刘髡的墓。在墓室后室清理出1枚厌胜钱（编号为84号），外呈圆形，中为菱形孔，孔外饰以假方穿。面铸“辟兵

莫当”4字篆文，逆时针方向旋读，字间以乳钉纹相隔，背平素。钱径74mm（图4）^⑤。1975-1976年，在内蒙古准格尔旗川掌公社勿尔图沟一带的广衍故城附近，发掘了几批墓葬。其中，在八圪地梁与托赖梁清理的17座秦汉墓中，仅出土1枚厌胜钱。有内外郭，两面皆有篆书铭文，一面为“辟兵莫当”，另一面为“除凶去央”，字间以乳钉纹相隔。上连一纽，纽有穿孔；下连一环。钱径24mm（图5）^⑥。

在目前经过考古发掘的东汉墓葬中，笔者未见有厌胜钱资料，但在后期钱币窖藏与墓葬中出土的零星厌胜钱，被认为属于东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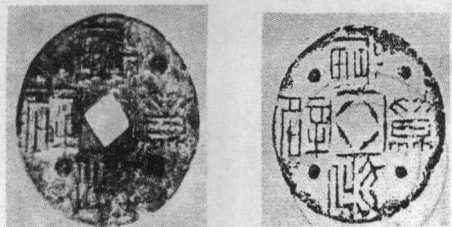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 山东巨野红土山西汉崖墓出土厌胜钱



图5 内蒙古勿尔图沟汉墓出土厌胜钱

时期。1963年，河南省宜阳县三乡公社后院大队社员在洛河岸发现一钱币窖藏，共计出土钱币150余公斤。包括西汉半两、西汉五铢、大泉五十、货泉、布泉，三国蜀汉直百五铢、直百、太平百钱，东吴大泉当千及北魏永安五铢等。其中有1枚厌胜钱，圆郭方穿，面无内郭。正面穿左侧一人戴帻垂衣，双手似捧物，呈端坐状；穿右侧一人拱手跪坐，长裾垂地。背面穿上有一环首刀，穿两侧各立一人，穿下有一鱼。钱径25、穿宽10mm（图6）^⑦。1991年，香港中文大学在香港大屿山白芒晋墓M1中发掘出土1枚五铢厌胜钱。正面穿上有北斗七星，穿下有一鱼。背面穿上有一带钩，穿两侧各有一环首刀，穿下有类似杵状之物。钱径25、穿宽10mm。吴荣曾先生认为此钱应为东汉时期（图7）^⑧。



图6 河南宜阳三乡钱币窖藏中的东汉厌胜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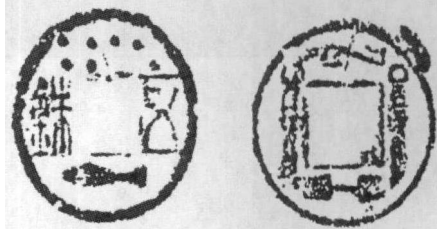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7 香港大屿山白芒晋墓M1出土东汉厌胜钱

笔者将王当墓出土铜牌与全国其他地区两汉时期厌胜钱做了对比，并与洛阳相关学者进行了探讨，初步认定王当墓出土铜牌不是厌胜钱，理由如下：

其一，它们与汉代厌胜钱形制特点不符。西汉墓中出土的2枚厌胜钱，形制仿照流通的五铢钱形，外圆内方，再加上圆环、乳丁纹等。被认为是东汉厌胜钱的2枚带有画像的钱币形制也是圆形方孔。而王当墓所见铜牌虽为圆形，但无方穿。戴志强先生曾对厌胜钱有过一段精彩论述：“所谓非正用品，古钱学家统称之为‘压胜钱’，则是指并非作为流通货币而铸造的‘钱’，它只是在文化意义上或者说在形制上和货币神似，但不行使货币职能，它们是货币文化的衍生物。”^⑨文中所说的“在形制上和货币神似”，应该是指厌胜钱在形制上一般亦为圆形方孔。

其二，西汉厌胜钱两面均有篆书体汉字钱文，其间以乳钉纹相隔；东汉厌胜钱皆为人物、星辰、器物图像，偶有动物形象，如鱼的图案。而王当墓所出4件铜牌，正面均以动物或几何图案作为主体，背平素，有可能是附着于某物之上。两者相比，两汉厌胜钱未见有以动物为主题图案的，只是占据币面下方四分之一空间。

其三，王当墓铜牌直径较大，重量更重，与汉代厌胜钱、五铢钱有较大差别。西汉厌胜钱径一般为23—24mm，个别的直径达到74，东汉的为25mm。王当墓出土的4件铜牌直径为27—28、厚2.2—2.5mm，重13.4—14.6g，无论是钱径、厚度，还是重量，都远远超过两汉厌胜钱和东汉五铢钱，而接近新疆发现的贵霜铜钱^⑩。

表一

汉代铜牌与钱币比较一览表

单位: mm, g

名称	直径	厚度	重量	资料来源
王当墓兽纹牌 1	27.5	2.5	14.6	注释 4
王当墓兽纹牌 2	28	2.5	14.3	注释 4
王当墓柿蒂纹牌	27	2.2	13.4	注释 4
王当墓马纹牌	28			注释 3
临潼杨氏墓 M4 兽纹牌	27	3		注释 14
东汉建武五铢	26	1.7	3.5	注释 4
东汉四出五铢	26.2	1.5	3.3	注释 4
新疆贵霜铜钱	27	3	16.3	注释 10

二 铜牌上的有翼神兽形象

1. 铜牌性质推测

既然王当墓所出 4 件铜牌不是厌胜钱, 那么其性质应当是什么?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。由于王当墓遭盗扰, 器物原始位置已发生改变, 难以判断 4 件铜牌的性质及用途。笔者结合其他地区汉墓材料以及该墓出土器物, 略做以下推测:

第一, 棺饰。在四川、重庆等地汉墓中出土较多棺饰铜牌, 形制多样, 其中有璧形、柿蒂形牌饰, 但其形较大, 均为鎏金。如云阳故陵东汉中期 M8 出土的璧形牌饰直径 160、孔径 62mm^⑩。在重庆巫山一带, 出土有东汉晚期圆形铜牌, 牌上有西王母、神人、天门等图案, 并有“天门”铭文, 铜牌直径为 230—275mm^⑪。洛阳王当墓所出 4 件铜牌亦为圆形, 但直径较小, 其中一件主体图案为柿蒂纹, 另外 3 件有翼神兽图案为瑞兽形象, 或为棺饰。

第二, 漆器上的装饰品。据王当墓发掘简报说, 墓中出土有一组铜饰(编号为 M1: 75), “均残, 系铜片, 有圆形、弧形、曲折形等, 可能是漆器上的装饰品。”^⑫ 4 件铜牌直径 27—28mm, 体形较小, 作为漆器上的装饰也是有可能的。类似的例子, 是见于陕西潼关汉魏时期墓葬出土的铜牌。1959 年, 在陕西省潼关吊桥发掘 7 座东汉至三国曹魏时期

的墓葬。其中, 在墓 4 出土兽纹铜饰物 1 件, 圆形, 一面铸兽纹, 直径 27、厚 3mm (图 8); 墓 5 出土骨刻饰物 1 件, 方形, 两面刻有天鹿, 一端凿凹槽, 边长 25mm (图 9)。墓 4 可能为杨彪墓, 杨彪卒于曹魏黄初六年(225)。墓 5 出土有东汉建宁元年朱书陶罐, 可知该墓纪年为公元 168 年^⑬。简报将墓 4 出土兽纹圆形铜牌称为“饰物”, 其形制、大小及图案等与王当墓所出的 2 件有翼神兽铜牌相似。



图8 陕西潼关吊桥墓4出土铜牌饰



图9 陕西潼关吊桥墓5出土骨刻饰物

总之,笔者认为,王当墓出土的4件铜牌不是厌胜钱,以上对其性质略做推测。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,不宜下定论,还有待于今后做进一步研究。

2. 铜牌上的兽纹考证

以往我们认为,王当墓花钱上“兽纹以有独角和双翼而形状特别,从形体上看,颇似天鹿,文献亦作天禄。”^⑤经过较为深入地分析,笔者提出,王当墓2件铜牌上的兽纹应是麒麟纹,新发现铜牌上的图案应是天马形象。

(1) 麒麟

王当墓出土2件相同兽纹铜牌的基本特点是独角、双翼、蹄足,这与麒麟纹的特点较为符合。关于麒麟的文献记载较多,见于《公羊传·哀公十四年》、《诗经·周南·麟之趾》、《礼记·礼运》、《史记》等文献。西汉长安城中的一些建筑以麒麟命名,如麒麟阁、麒麟殿、麒麟馆等。《三辅黄图》卷二《汉宫》:“《汉宫殿疏》曰:‘未央宫有麒麟阁、天禄阁,有金马门、青琐门、玄武、苍龙二阙。’”卷三《未央宫》:“麒麟殿,未央宫有麒麟殿。”卷五《观》:“麒麟、朱鸟、龙兴、含章,皆馆名。”还曾在青梧观发现2件石麒麟。《三辅黄图》卷五《观》:“青梧观,在五柞宫之西。观亦有梧桐树,下有石麒麟二枚,刊其肋文字,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。头高一丈三尺,东边者前左脚折处有赤如血。父老谓其有神,皆含血属筋焉。”^⑥

当代学者对麒麟的研究成果丰硕,不乏创见。孙机先生引书12种,列举了古文献中关于麟的记载,结论是:“综合各书记载,可以约略推想麟的形状。麟的躯体大致像鹿,但也有认为它像马的,所以麒麟又可以写作‘骐驎’。不过最主要之点,各家均无异词者,是说它生了一只独角。”并收集了一些文物上的麒麟纹^⑦。

林梅村先生认为,“骐驎当系吐火罗神

祇,意为‘天马’或‘神马’。”

“先秦文献多次提到麒麟,月氏人西迁中亚以前麒麟已经传入中原。从中亚大月氏王陵出土的神兽看,麒麟是一种长有双角的翼马。麒麟和天禄都是带翼双角神兽,两者常被混淆。它们的区别在足部。麒麟系蹄足,而天禄为爪足。大月氏王陵所出麒麟均为蹄足。河南邓县汉墓出土麒麟画像砖的麒麟亦为蹄足,并有‘麒麟’题铭可资佐证。而题铭为‘天禄’的石兽系爪足。”^⑧例如,1974年,在洛阳偃师寇店李家村东汉铜器窖藏中出土的鎏金铜麒麟^⑨,特点很明显,即独角、蹄足。

李零先生提出:“汉以来,学者多谓麒麟是一种麕身、牛尾、狼额、马蹄的神物,雄曰麒而无角,雌曰麟而一角,并且角端有肉。但因为麒麟单称只叫‘麟’,所以更多是以‘一角’而为人所知。其出土形象,上文已说,是以一角而角端有肉者为多,但也有作山羊形象,头戴尖长角而两角并合者。”^⑩

综合孙机、林梅村、李零等先生的观点,可知麒麟特点是独角、蹄足,有的带有双翼,甚至有的为山羊形象,头戴尖长角。如1975—1977年陕西西安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出土带翼山羊纹玉雕饰件,直径42mm^⑪;1972年7月,广西西林县八达公社普合大队普驮粮站清理一座西汉早期墓葬。其中有5件山羊纹鎏金牌饰,平面如鞋底形,折边,周边有细小钻眼,下面压印出突起的山羊一只,站立举头回望,脚踏山峰,头顶云彩,长131、宽65mm^⑫。孙机先生将这2件文物上的动物纹饰均定为麒麟纹^⑬。而洛阳王当墓出土兽纹铜牌,与西汉长安城武库遗址浮雕饰件、广西汉墓出土的铜牌饰相似,形如山羊,头戴弯曲的尖长角,三蹄站立,一前蹄抬起略弯,举头回顾。由此认为,王当墓出土铜牌上的有翼神兽形象应是麒麟。

(2) 天马

最早记载天马的历史文献，见于《山海经》卷三《北山经》：“又东北二百里，曰马成之山，其上多文石，其阴多金玉。有兽焉，其状如白犬而黑头，见人则飞，其名曰天马，其鸣自訢。”^④

西汉时期，武帝对天马的喜爱达到了空前的地步。《史记》卷一二三《大宛列传》：“初，天子发书《易》，云‘神马当从西北来’。得乌孙马好，名曰‘天马’。及得大宛汗血马，益壮，更名乌孙马曰‘西极’，名大宛马曰‘天马’云。”^⑤《汉书》卷六《武帝纪》：元鼎四年“六月，得宝鼎后土祠旁。秋，马生渥洼水中，作《宝鼎》、《天马之歌》。”李斐注云：“南阳新野有暴利长，当武帝时遭刑，屯田敦煌界，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，中有奇（异）者，与凡马[异]，来饮此水。利长先作土人，持勒鞞于水旁。后马玩习，久之，代土人持勒鞞，收得其马，献之。欲神异此马，云从水中出。”^⑥《汉书》卷二二《礼乐志》：《天马歌》，“元狩三年，马生渥洼水中作。”^⑦《汉书》卷九六上《西域传》：大宛国“别邑七十余城，多善马，马汗血，言其先天马子也。”孟康注：“言大宛国有高山，其上有马不可得，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集，生驹，皆汗血，因号曰天马子云。”^⑧

霍巍先生就此指出：汉代所谓“天马”，原意系指产自西域大宛等国的上等良马，“但是在汉代这样一个特殊的、神仙方术色彩极其浓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，其初始的意义在进入中土之后却已经被彻底地加以神化和改造，与中国先秦以来的以升仙不死为中核的‘昆仑’神话系统发生了密切联系。这些西域的良马被赋予能够托举乘者登仙，通过昆仑、天门（阊阖）最终进入‘天国’的神奇功能，因而被称为‘天马’。而这场‘造神运动’的始作俑者看来就是汉武帝本人。”“由于汉代帝王深信西极天马是能

够载其通达昆仑、天门进而升入天国的神马，对天马的崇拜之风也必定风行全国。”^⑨

在洛阳出土的一些西汉画像砖上，模印有带羽翼的天马形象，或与朱雀、三株树为一组，或一马独立为一幅画面。天马肩生翼翅，昂首挺立^⑩。在偃师寇店李家村东汉铜器窖藏中出土的鎏金铜翼马，肩生“山”字形翅膀^⑪。王当墓新发现铜牌上带有翼翅的马纹，与上述形象基本近似，均为肩生翼翅，但表现的手法略有不同。所以，笔者认为，王当墓这件新发现的带翼翅的马纹铜牌，反映的应是天马形象。

(3) 麒麟、天马等有翼神兽形象的渊源

有翼神兽在国外称为格里芬（Griffin）。在公元前6—4世纪小亚西亚、希腊、爱琴海北岸等地出土的钱币上，就出现了有翼神兽的形象（图10）^⑫。李零先生撰有《论中国的有翼神兽》一文，对中国境内出土与有翼神兽相关的文物资料进行了全面、系统、深入的探讨。文中谈到：“中国对格里芬的接受可能有不同渠道，既可能从新疆方向接受中亚和西亚的影响，也可能从内蒙和东北接受来自欧亚草原的影响。”羊首格里芬或带翼羊，“其形象是以西亚和中亚地区的亚洲野山羊为原型而添加翅膀。这种格里芬是偶蹄有角的格里芬。”^⑬洛阳王当墓出土的2件铜牌上的麒麟纹，独角、偶蹄，似是以上述野山羊为原型的。总之，学术界普遍认为，中国发现的有翼神兽形象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。



图10 《格里芬的飞翔》收录外国钱币上的有翼神兽形象

三 结语

本文主要是对洛阳东汉王当墓出土的3枚有翼神兽铜牌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,认为不是厌胜钱,其主体图案分别为麒麟与天马形象。

实际上,洛阳发现汉代有翼神兽题材的文物数量较多,形体较大。根据质地的不同,大致可分为石刻、铜器、陶器等三类。石刻主要有天禄、辟邪等大型神道石刻,目前共计出土6件,其中郊区孙旗屯2件,孟津县2件,伊川县1件,偃师市1件,另有石翼羊、石辟邪砚盖等小型石刻;铜器有东汉鎏金铜翼马、铜砚滴等;陶器有辟邪器座^⑧。汉代洛阳有翼神兽题材的广泛运用,使当时的葬俗、随葬器物种类发生了较大变化,而这一切与东汉国都雒阳城现实生活的历史大背景密不可分。《后汉书·五行志一》:“灵帝好胡服、胡帐、胡床、胡坐、胡饭、胡空侯、胡笛、胡舞,京都贵戚皆竞为之。”^⑨西域胡人文化习俗对东汉雒阳达官显贵生活所产生的较大影响,势必会波及到下层民众之中。洛阳王当墓纪年为东汉光和二年(179)，“光和”恰为汉灵帝所使用的第三个年号(178—183年)，王当墓中出现具有异域文化色彩的有翼神兽纹饰铜牌亦在情理之中。

综上所述,通过对洛阳东汉王当墓中所出兽纹铜牌的分析,笔者得出以下结论:第一,洛阳东汉王当墓出土4枚圆形铜牌不是厌胜钱,推测其性质可能为器物上的饰件,有待于做进一步研究;第二,独角兽纹铜牌正面主体图案应是麒麟纹,新发现铜牌上的有翼神兽形象为天马;第三,王当墓出土有翼神兽铜牌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。

附记:在本文写作过程中,承蒙四川大学张勋燎、霍巍、黄伟等先生、北京大学李零先生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余扶危、朱亮、程永建等先生、关林管理处赵振华先生给予诸多指点,使笔者获益匪浅。程永建先生为本文提供4件铜牌照片及马纹铜牌拓本,南

京大学冯慧博士帮助收集国外有翼神兽钱币资料,谨致谢忱。

注释:

① 为便于行文,本文将考古简报中所说的“币形器”,统称为“铜牌”。

②⑬ 洛阳博物馆:《洛阳东汉光和二年王当墓发掘简报》,《文物》1980年第6期。

③ 该资料由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程永建先生提供。

④⑮ 蔡运章、李运兴、赵振华、程永建、霍宏伟:《洛阳钱币发现与研究》,中华书局,1998年,文见第385页,图见第392页。

⑤ 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:《巨野红土山西汉墓》,《考古学报》1983年第4期。笔者按:该报告中说的厌胜钱径74mm,超出正常钱径,或为笔误。

⑥ 崔璋:《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》,《文物》1977年第5期,简报未写明厌胜钱的出土单位,由其形制、钱文分析,应为西汉厌胜钱。

⑦ 赵新来:《河南滎池宜阳两县发现大批古钱》,《考古》1965年第4期;陈娟:《宜阳出土的汉代压胜钱》,《中原文物》1984年第3期。

⑧ 邓聪等:《香港大屿山白芒遗址发掘简报》,《考古》1997年第6期;吴荣曾:《香港大屿山白芒晋墓出土五铢厌胜钱考略》,《中国历史文物》2005年第2期。

⑨ 戴志强:《古代中国的钱币》,《中国钱币》2003年第2期。后收入《戴志强钱币学术文集》,中华书局,2006年,第325页。

⑩《新疆钱币》图册编辑委员会编:《新疆钱币》第183、233页,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、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,1991年;《新疆考古研究所:《新疆民族文物》,文物出版社,1985年版)。

⑪ 蒋晓春:《有关鎏金棺饰铜牌的几个问题》,《考古》2007年第5期。

⑫ 重庆巫山县文物管理所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队:《重庆巫山县东汉鎏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》,《考古》1998年第12期。

⑬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:《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发掘简记》,《文物》1961年第1期,第64、65页,图37、38。

⑭ 何清谷撰:《三辅黄图校释》第119、157、330、337页,中华书局,2005年。

⑮⑯ 孙机:《几种汉代的图案纹饰》,《文物》1982年第3期,图12采自第65页,图二。

(下转47页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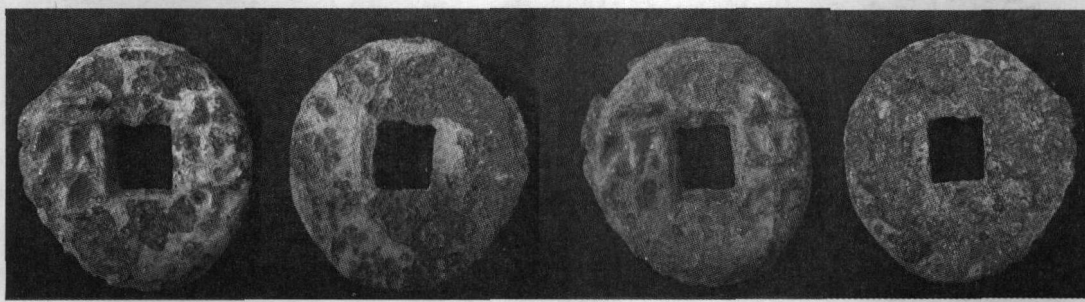
陇南出土铁质秦半两

刘可通

近年陇南文县铁炉沟境内出土铁质“秦半两”（见图），直径42、厚5mm，重27g，半两铁钱古朴粗犷，钱文笔划粗细不等，地章高低不平，中间方孔，无轮廓，明显具有秦半两特征。铁钱钱文“半两”小篆，文字

高挺，“两”中“人”字偏下，上横较短，“半”字下横较长。

文县铁炉沟铁矿富集，即山开炉铸造铁制农具历史久远，地名因称铁炉沟。



（责任编辑 高聪明）

（上接 23 页）

⑱ 林梅村：《古道西风——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》第161页，三联书店，2000年。笔者按：河南邓县墓应为南朝墓，详见柳涵：《邓县画像砖墓的时代和研究》，《考古》1958年第5期。

⑲ 周剑曙、郭洪涛主编：《偃师文物精粹》第61页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7年。

⑳ 李零：《论中国的有翼神兽》，载《入山与出塞》第112页，文物出版社，2004年。

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：《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发掘的初步收获》，《考古》1978年第4期，第265页，图六。

㉒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：《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》，《文物》1978年第9期，图15采自第45页，图三。

㉓ 袁括校注：《山海经校注》第86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。

㉔ 《史记》卷一二三《大宛列传》，第3170页，中华书局，1982年。

㉕ 《汉书》卷六《武帝纪》，第184、185页，中华书局，1990年。

㉖ 《汉书》卷二二《礼乐志》，第1060页。

㉗ 《汉书》卷九六上《西域传》，第3894、3895页。

㉘ 霍巍、赵德云：《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》第198、205、206页，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，2007年。

㉙ 黄明兰：《洛阳汉画像砖》第70页，河南美术出版社，1986年。

㉚ 同19，第64页。

㉛ [日]林俊雄：《格里芬的飞翔》第152页，雄山阁出版，2006年。

㉜ 同20，第118—120页。

㉝ 霍宏伟：《洛阳出土有翼神兽文物综论》，未刊稿。

㉞ 《后汉书·五行志一》，第3272页。

（责任编辑 高聪明）